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内容提要	1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7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31
康有为思想研究	92
谭嗣同研究	182
论严复	249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286
论孙中山的思想	312
章太炎剖析	382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421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439
后 记	472

内 容 提 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1) 解放后研究成果肯定了这场革命的农民战争性质，缺点是未深入探讨其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经验。

(2) 洪秀全借来的西方上帝比传统宗教更便于发动、组织下层群众，其中特别是“崭新”的仪式戒律被改造为严格的军事纪律，起了很大作用。

(3) 以宗教信仰、道德说教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不可能持久。不应把农民革命和农民领袖理想化。

(4) 砸烂的只是孔子的牌位，军事斗争冲击了“四根绳索”，却不能变更它。

(5) 《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与空想性，纯从消费、分配着眼，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违反了客观历史规律。

(6) 集体化、单一化、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蓝图，企图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组织和权力支配社会。

(7) 《资政新篇》是珍贵的续编，它比小生产者的空想更符合历史的发展。

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1) 龚自珍的浪漫前奏曲和魏源、冯桂芬的历史地位。

(2) 七十年代马建忠、薛初成等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主张。

(3) 发展新经济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改革：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政治主张，开议院成为变法维新的关键。

(4) 新旧意识形态既尖锐对立、又相互依存。

(5) 九十年代改良派思想的高峰，理论上的成熟，提出了民权、平等等重要观念。

(6) 与封建主义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斗争：反对“中体西用”。

(7) 低估了封建顽固势力，要求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第一次失败，改良派自由主义让位于革命派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康有为思想研究

(1) 康的思想体系的四个方面及其成熟过程。

(2) 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渗入先进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当时主要特色之一。

(3) 传统人性善恶命题论辩的时代内容：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反对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欲论。

(4) “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

(5) “大同”空想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容：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是其主要特点。

(6) 人权、平等、自由、独立作为理想大同社会的基本原则。

(7) “托古改制”在政治斗争中的实践意义。

谭嗣同研究

(1)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时代阶级特征：九十年代的改良派左翼。

(2) 谭的“以太”基本上是物质性的概念。

(3)“仁”与“以太”的多层关系。

(4)“心力”是唯心论概念，“心力”与“以太”能否等同诸问题。

(5)对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是谭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

(6)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诡辩论、科学与宗教、革命与改良……一系列悲剧性的矛盾。

论严复

(1)严的历史地位不在代表改良派，而在给近代中国人以进化论的新世界观。

(2)这是他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影响了好几代知识分子，《天演论》不只是翻译。

(3)介绍英国经验论哲学和逻辑归纳法。

(4)对理论思辨重视不足，从而由经验论到主观唯心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近代中国哲学一个重要教训。

(5)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介绍《原富》《法意》)是未起影响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1)中国近代分为四期(1840—1864, 1864—1894, 1894—1911, 1911—1919);两个革命高潮,两个低潮。

(2)自立军运动和拒俄义勇军是革命派发展中的两个关键环节。

(3)由爱国而革命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不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而是国家的独立富强,成为出发点和首要问题,它为以后几代革命者所不断重复。

(4) 兴中、华兴、光复三会有不同特色。

(5) 陈天华的反帝救国，章太炎、朱执信的主观社会主义是具有代表性和有社会根源的思想。

(6) 邹容呐喊的人权、民主、自由最终被淹没在上述两种思潮之中。

(7) 反帝、反满遮盖了反封，对封建主义以新形式或旧形式继续统治估计不足，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论孙中山的思想

(1) 建设富强祖国、反对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两大内容。雄伟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2) 民权主义本应是革命的中心。《民权初步》的积极意义。

(3) “权能分开”说的严重弊病，“万能政府”在中国条件下便可向封建法西斯变质。

(4) 民生主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又反对资本家。

(5) 孙的“生元说”。中国近代哲学的某些特征。

(6) 革命的失败突出了理论的重要性。《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的唯物论的认识论。

(7) 唯心论的民生史观，停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

章太炎剖析

(1) 决定章的历史地位的是作为宣传家思想家的第二时期(1900—1908)。

(2) 章的思想来源、成分、过程、时期的种种复杂性，古文经学和佛学唯识宗是主干。

(3) 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特征：反对代议制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反对物质文明，反对进化论。

(4)认为道德才是社会的法规，革命的动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最为重要。

(5)这独特地反映了在封建生产方式束缚下的宗法农民思想，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空想性和封建性。

(6)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与上述政治社会思想溶为一体。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1)梁、王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应予肯定的人物，功大于过。

(2)梁广泛宣传介绍了资本主义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起了反封建的进步作用，是影响最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

(3)王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代表。郭沫若对梁、王二人的评价。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1)对下层人民的爱与对上流社会的憎是鲁迅一生特色。提出“国民性”问题。人道主义比个性主义更根本。

(2)早年以1906年为界，第一段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第二段受章太炎的重要影响。

(3)前期以1925年为界，第一段是用“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作为改变“国民性”的新战略。

(4)第二段是与反动派统治人物的直接搏斗，它在鲁迅思想发展中有关键意义。

(5)前期积累了许多接近或吻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念、思想，1927年秋冬是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的开始。

(6) 鲁迅作品的抒情风格。

(7) 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

后 记

(1) 偶然与必然应是历史哲学的中心范畴。

(2) 中国近代三大进步思潮及其对立面。

王 健 著

关于大文，进入的史实于道士史分世国中县王，(1)

说，原学文，原史原，原史入义主本资丁接介的直发气案(2)

。原学直案自总何开史国中由大景向爆兵，用并史世由原注及丁

二王，原学原原。原升由原学或原原得气发国中县王(3)

。原学的人

王 健 著

原学，原学原一原学原原的会并原上原学原的另人原下原(1)

。本原更义主部个史义主原人。原同“原原原”出

二原，义主原原学原原原原原一原，原学原1906原原原(2)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学原1925原原原(3)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4)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5)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6)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一、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二、砸烂孔丘的牌位

三、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四、《天朝田亩制度》

五、《资政新篇》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最大的应推太平天国。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上，或在论著的质和量上，都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充分肯定和歌颂了这场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农民战争。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而最重要的缺点则是忽视科学地探讨农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总结这场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经验教训。近些年，在“四人帮”严重破坏下，更不许谈这方面的问题。相反，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其所谓歌颂农民革命的旗号下，故意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神乎其神，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尽速澄清这种混乱。下面试就人所熟知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各种内容，如以经济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和“太平”“天国”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口号，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①。从汉代的《太平经》^②到唐代的《无能子》^③，从《诗经·硕鼠》里的“适彼乐土”到《抱朴子·诘

^① 八十年前就有人强调洪秀全搞的一套与中国下层社会的秘密会社有关，“其称天为父，及国号天国，官以天名，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近人研究表明，太平天国那许多隐语、暗号以及某些观念，也与下层会社有关。参见谢兴尧《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1935年）。

^②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天地施化得匀，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故言太平气也”（《太平经》），等等。

^③ “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圣人者之过也……”（《无能子》）。

鲍篇》^①的“安土乐业，顺天分地”，都确如列宁所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②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套新的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之来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阶级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洪秀全，他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是这场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领（前期的组织家和军事领袖主要是杨秀清）。与一般思想家很不相同，洪秀全的思想已成为千万农民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现实斗争的武器，成为太平军的灵魂，并且也是太平天国“钦定”的意识形态。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借来了一个西方的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一本毫无革命意义和思想价值的基督教的拙劣宣传品。但它所联系某些中国现实所宣传和翻译的《圣经》教义诸如天父、耶稣、洗礼、祈祷、仪式以及反对偶像、斥责儒、道、释……等等，对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确乎闻所未闻，是与中国各种传统观念和思想形式，从孔孟经书到佛道迷信，大相迳庭的新鲜事物。应该说，正是这一点，符合了考场失败正无路可走的洪秀全的迫切需要（他的那场大梦，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对现实制度的满腔愤慨和泄愤式地要求报复与反抗的意念：一个没人瞧得起、屡次考不上的穷书生，偏偏要来统治山河，主宰人世）。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新鲜理论、观念

^① “……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抱朴子》）

^②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三页。

和仪式符合了当时封建统治比较薄弱，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的广西地区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借来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比皇帝的权威还要大的上帝，来打倒、否定和扫荡世间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①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比起三合会、三点会的下层传统秘密结社更具有上述功能，更便于与旧观念和习以为常的旧生活方式决裂，把会众的思想、行动和全部生活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原道救世歌》）。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到《原道觉世训》，^②洪秀全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劝世良言》强调的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原道觉世训》中却充满“他是何人，竟巍然称帝者乎”之类的战斗呼声。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当地农民起义的需要。并非如国外某些论著所认为，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形式。

洪秀全对那种种强调谦怯自卑，逆来顺受、甘于屈辱、安于命运，所谓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上去之类的《圣经》教导舍弃不要，明白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基本舍弃了《劝世良言》中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二一页。

② 这个发展过程尚待进一步探究，因前二篇并无革命意味，国外一些论著强调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种族、宗姓之间的械斗，使教义发生了变化，等等（如 Philip A. Kuhn 《太平天国观念的根源》，《社会历史比较研究》1977年第7期），这不对。

种种叫人安分守己、服从封建统治、维护现有秩序、不欠债、要完粮之类的东西。洪秀全强调宣传的是所谓“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和斗争，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斩妖杀魔，“上帝差朕降人间，……尔等妖魔须走快”（《九妖庙题壁》）；“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永安突围诏》）；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博爱”之梦，而是农民弟兄的复仇之神^①。洪秀全在起义之前还宣传一些甚么“止杀”“是以先代不嗜杀，德合天心天眼开”（《原道救世歌》），“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原道醒世训》）。到了后来却一再指出，“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诚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资政新篇》上的洪秀全批语）。正如洪仁玕所说，“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以仁爱给他们”（《天京游记》）。可见，洪秀全的上帝及其革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特别是当时你死我活的极其剧烈残酷的军事斗争）所决定、支配和改变的。

普列汉诺夫讲到宗教时曾提出观念、情绪和活动（仪式）是三个要素（《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

^① “我们的圣经注解，都很难得到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实在是反耶稣福音书的。”“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天京游记》）。又如：“如冒称直接与神晤对……上帝临凡，此诚与吾人就基督教圣经中所习见者大相径庭也”。“……彼等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称之为一种伪的启示，……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传教士发现他们很少与太平军一致之处，……洪秀全的教义是完全不象我们那样会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也和耶稣所说的话极不相同。”“太平天国运用了基督教特别是旧约里的思想和仪式，例如施洗和遵守礼拜制度等，可是并没能接受基督教的许多基本道理，……他们略去了爱、宽恕、谦卑，关怀自己邻人等等基督教特有的教义”（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八章第二节）。

经济平均主义和原始朴素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三者之中后者本最实在和具体，一切宗教都必须依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和情绪。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为“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后又不断扩充发展为更为完备的各种《行营规矩》、《定营规条十要》、《行军总要》等等。例如，“人皆兄弟”的观念在这里便具体化为官长必须爱惜兵士，军队必须爱护百姓等等（见《行军总要》）。①拜上

① “十款天条”是：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淫，八不偷窃劫抢，九不讲谎话，十不起贪心。五条纪律则是：“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惟，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定营规式十要”是：“一要恪遵天令，二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谕谕，三要炼好心肠，不得吸烟饮酒，公平和惟，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五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六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插鼓号令，七要无事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八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九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十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行营规式：一令各内外将兵凡自15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二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老百姓），三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要杂入御舆官妃马轿中间，四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五令兵军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抄药材铺户并府州县衙门，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瞞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七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窑困睡，耽阻行程，务宜前后联络，不得脱徙，八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九令不得枉杀老弱及无力挑夫，十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行军总要”中的规定：“……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毋论何人马匹俱牵与能人骑坐，……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

“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

“凡巡更把卡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裘，即令各官夜间

帝会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和热烈感情，就这样在这种神圣化了的纪律和仪式中得到了宣传、贯彻和严格执行，在斗争中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种仪式、纪律和宣传，非常重视“天情道理”的宣讲，这种宣讲的突出特点是把宗教观念与起义前后的革命历史揉杂在一起^②，实际是太平天国特有的思想教育。太平天国强调要“换移心肠”，“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天情道理书》），“凡刑人必讲道理，掠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贼情汇纂》）太平天国有一套又一套的非常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升天”“宣欢不宜哭”（《天条书》）等等，例如“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每饭不忘除妖魔”（《癸甲金陵新乐府》）。这种重视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的思想教育）和仪式规定（太平天国的组织纪律），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以能耐劳苦忍饥渴为技，……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贼情汇纂》）。一方面，借助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确改变了封建农

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着。”

“凡营盘之内俱要洁净打扫，不能任意运化作践，……以及在无羞耻处润泉（小便），……凡我兄弟行路，不准强拉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内打馆，亦不准妄取一物。……凡我兄弟俱要修好炼正，不准吹洋烟，吃黄烟、饮酒、虏掠、奸淫，犯者斩首不留。……路旁金银衣物，概不准低头捡拾，以及私取私藏，违者斩首不留。

凡无故杀害外小者斩……

凡焚烧外小房屋者斩……

凡虏掠外小财物者斩……。”

^② 参看《天情道理书》。实际宣讲情况如“……升座良久方致词：我辈金陵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峻，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平时，举足便上天堂梯……”（《癸甲金陵新乐府》）。

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大军；另一方面，又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现实需要，舶来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向西方学习”必须适应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才有作用。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所宣传的观念、道理，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①，因此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长久地信服，便是一个问题。首先，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对这种宗教教义信仰的忠诚度并不一致。杨秀清、肖朝贵搞的“天父”“天兄”下凡附体^②，对他们自己来说，明知是一种欺骗，这与洪秀全真正相信梦境里的真实是不同的。洪仁玕说：“兵者，势也。因其势而导之，则一往莫遏……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此中奥妙，无人知觉”（《资政新篇》），也透露了与杨、肖类似的消息。石达开则是一开始便“不甚附会邪教但说”（左宗棠：《与王璞山书》），后又“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吉庆元朱衣点上天王奏》）。其次，尽管惩罚极严，有杀头危险，但从李秀成到洪天福等等早期就仍违反天条，偷看禁书（见他们的《自述》）。思想、观念、情感、意志靠一种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宗教信仰和强制纪律来统一和维系，是不可能支持长久的。它必将走向

^① 因此不能同意认为洪秀全的哲学是泛神论或唯物论。尽管在起义前的论著以及《天情要理》中有可以勉强解释为自然神论的个别语句，但洪秀全建立起来的明明是一个人格神，它具体过问世事，指挥人间，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支配着世界，“尔知我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么”（《天父下凡诏书》），而且还活灵活现与洪秀全晤对，以及下凡附体等等，这那里是甚么泛神论、唯物论？怎么能和崇尚理性，反对天启的冈采尔相比附？

^② 它显然来自广西当地的民间风习，“涪州僻居山乡，……民间流行降托旨圣之说”（罗尔纲：《洪秀全起义前年谱》）。

反面。特别是经过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巨大事件之后，忠诚的信仰就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资政新篇》），仪式流为形式，禁欲转成纵欲，道德纯洁走向道德毁坏……。前期那种夫妻同居一次也得杀头，那种“虽极热，夜卧不得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贼情汇纂》）之类的严厉禁律，官兵王侯，比较平等^①，“寝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动人情景，都不再能继续维持……。这表明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方向。洪秀全从前期经验出发，直到最后仍一再颁布各种诏令，极力强化道德说教和宗教宣传，结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现在却收效极微。以前好些论著说洪秀全到天京后如何昏聩无能，不问政事，以致失败。其实洪秀全始终是管事的，并且与前期一样，仍然在行政、组织、军事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锐、识力和才能，例如选拔将领（如英、忠、辅、侍等）、任免人员（如赏罚严明，对干、英、忠诸王亦不少贷）、决定战役（如东征、第二次西征等等）。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纲政策上仍然顽固坚持、并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学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他不是如实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结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义和前期的经验不放，甚至最后在改国名、朝名、玉玺名上面作文章，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等等，以期拯救危局，改变形势，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这个洪秀全个人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阶级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所以，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

^① 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其实一开始就有等级尊卑的严格规定，如六王可以有众多妻室，而以下任何官兵，夫妻不许同宿。农民起义的诸首领开始具有某种平等地位，历来如此，并非太平天国有所特殊，如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一字并肩王”等等，均同此。